

全球化^的 负面影响

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

卡齐米耶日·Z·波兹南斯基/著
佟宪国/译

Negative Globalization:
Expropriation Of Eastern Europe
From National Capital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全球化的 负面影响

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

卡齐米耶日·Z·波兹南斯基/著

佟宪国/译

Negative Globalization:
Expropriation Of Eastern Europe
From National Capital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波兹南斯基著；佟宪国译.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ISBN 7-80162-877-2

I. 全... II. ①波...②佟... III. 经济一体化—影响—经济体制—东欧 IV. F151.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6407 号

出版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邮编：100038

印刷：北京宏伟胶印厂

经销：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张 艳

技术编辑：晓 成

责任校对：晓 泉

880mm×1230mm/32

9.5 印张 227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29.00 元

书号：ISBN7-80162-877-2/F·79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010) 68022974

邮编：100836.

中文版序

本人对1989年之后的东欧国家改革进行过多年研究。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学者来说,将自己的著作在中国出版,不啻获得一次莫大的奖赏。在向所谓的让市场发挥更大的驱动作用的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与东欧国家之间就两种体制转型模式所进行的专业知识交流,是十分有限的。而这恰恰是正确理解两者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所必需的知识。这样的思想交流如此地稀少罕见,对于其他国家的改革是有害无利的,因此,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通过出版本书这类的著作来纠正此种情况。

在东欧国家的经济学家当中,直至目前,他们都不大注意研究中国的改革经验,这种情况可以远远追溯到1989年之前很久。而在中国,有一段时期,人们十分关注东欧国家为培育市场力量所进行的努力,即东欧国家在上世纪整个70年代期间所进行的市场改革。之后,中国的改革家们特别饶有兴趣地研究了匈牙利和波兰的改革尝试。然而,在其后的若干年里,随着这两个国家以及其他东欧国家重又走上了更大规模地恢复国家管理经济的体制的道路之后,中国的这种兴趣就渐渐减弱了。

在东欧国家,目前仍没有迹象表明它们对于中国改革经验的态度已发生了变化,准备对之加以认真研究,因为那些国家仍旧深深地感到中国是一个情况很不相同的国家,中国的改革对于它们来说并无参考意义,而中国则正在改变自己的立场。起初,中国的改革家们认为,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并无借鉴价值,因为他们的结论是,东欧国家的改革在他们看来未能促进经济状况的改善,因此并没有多少积极经验可供汲取。中国自身的经济

成功，使中国人对自己的努力充满了信心。但是，不管怎么说，随着未来的改革可能会遭遇新的更加危险的局面，中国的改革家们似乎又热切地希望能从东欧国家的反面经验中汲取教训。

然而，要满足中国改革家们这种重新燃起的对东欧经验的兴趣却并不容易，因为总的来讲，东欧国家现有的消息来源并没有像中国的改革家们所想像的那样去勾勒东欧地区的改革情况。某些经济学家认为，东欧国家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它们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接受生产出现暂时的急剧下降、失业人数大幅度上升而且持续时间较长的事实。尽管如此，在那些持有这种积极态度的人中，大多数都断然否认 1989 年之后的改革曾经导致了任何灾难，他们辩解说，那种看似好像经济下滑的局面，从根本上讲，纯粹是一种统计学上的迷离，或者说是一种幻觉。

在我的书中，我斗胆唱出了反调，对东欧国家的改革提出了与上述、即与东欧国家的主流派经济学家不同的见解。我发现东欧国家 1989 年以后时期发生的经济下滑，不仅在统计学上是一个现实或者事实，而且这种经济下滑的严重程度也是当代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比上世纪 30 年代发生的大萧条还要严重。这种经济下滑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因为其用心多多少少都是相同的，就是要让市场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则创造出了当代世界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其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战后的日本。

东欧国家的许多人不愿意承认中国所走的这种反差极大的道路，他们采取这种漠视态度的理由是：东欧国家已经实行了经济转型，而中国则还没有实行经济转型，或者说中国现正实行的仅仅是匈牙利和波兰早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就曾尝试过的十分有限的改革。然而，本书却认为，无论选用什么样的标准衡量，只要是合理的，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与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其起点大致是相同的，与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一样，中国也已经让程度大体相当的市场力量融入了其经济体制。因此，将这些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

东欧国家的经济失败与中国的经济成功,从方法论上讲,都是完全能够说得通的。

因为无论东欧国家还是中国,一般地讲,所走的都是同一条道路,即改变自己的经济机制。但最终各自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却迥然不同,这种差异一定是各自在改革纲领上的差异,而改革纲领上的差异才是决定性的原因。按照这样的思路,人们也就会坚持认为,东欧国家于1989年之后时期突然出现的经济下滑与中国明显的经济上升两者间的巨大反差表明,中国与东欧在改革模式上表现出来的差异,其性质并不能只看作是一种量上的差异,而更应看作是一种质上的差异。

简而言之,所有东欧经济体都实行过十分激进的改革,即所谓的“休克疗法”,而中国则遵循了一条非常谨慎的循序渐进的改革路线。如果我们只考察东欧的各个经济体本身,人们似乎还可以说某些东欧国家实行的是真正的激进改革,譬如说波兰;而另一些国家,譬如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搞的则是渐进式的改革。然而,无论实际上整个东欧地区各国间的差异究竟有多么悬殊,如果我们以中国作为参照物,这样的差异也就都无足提及了。与中国相比,所有的东欧国家,其中也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不过代表着激进改革中的不同分支而已。

但是,东欧改革中的激进主义与中国改革中的渐进主义,并不是两者之间在各自所采取的方法上存在的惟一重大不同点。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改革的速度与广度问题,并不在于东欧国家的所有改革都被压缩到一个短暂的时间段内完成,而中国则允许改革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完成,而且也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即最为重要的是,在过去的若干年里,这些国家经济制度的核心成分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们的所有制构成或者所有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十分有趣的是,在所有实行了经济转型的经济体内,因之发生

的所有制构成上的变化并没有严格按照改革家们的设想去发展，而且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它们所得的一切结果都是前所未有的。于是，在东欧国家，尽管当地政府的初衷是想通过将国有资产转移到本国公民手中的途径对所有权进行激进的改革，但事实上，这些国有资产却绝大部分被转让给了外国人。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所有制结构，当然，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也是前无先例的。在中国，国家虽然并不允许将公有财产转让，但却坐视多种形式的所有制，譬如乡镇企业那样的所有制形式的出现。

中国通过选择逐渐变更所有制结构的方法，以让私营的和混合的（即国有和私有混合所有的）企业自然扩张的方式，避免了东欧国家所遭受的重大经济损失。这即是说，东欧地区除蒙受了经济下滑即生产下降和失业人数增加的损失外，还因允许将国有资产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折扣价格出售给外国投资者而蒙受令人难以置信的财产损失。实际上，这些国家通过几十年的艰苦卓绝的重大牺牲而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被以仅相当于其实际价值即其市场价格的一个零头的价格卖掉了。

一个国家在没有适当的监督管理的条件下出售国有资产，就总是要面临这样一种风险，这种拍卖活动会导致无缘无故地打折现象的发生。中国目前可能就面临着这样一种风险，因为中国最近作出决定，将首次允许将重大的国有资产转让给私人所有者。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不仅说明，那种滥拍滥卖国有资产的现象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而且还说明，如果允许将国有资产这样地拍卖给外国人，其经济后果也会是特别惨痛的。如果国有资产的销售对象是本国国内公民，那么，财富的再分配就只会发生在一个经济体的内部，但是，如果把国有资产卖给外国人，则后果就将是整个经济体的全面贫困化。

而且不仅如此，东欧国家为了外国人的利益而选择了激进的做法，将民族资本拍卖出手，结果给东欧地区的长远经济增长带来

了某些负面影响,中国的所有制改革与东欧国家的做法是不同的,中国的改革使得固定资产几乎全部都掌握在本民族的手中。东欧国家之所以会有那样的结局,是因为新的所有者恰好是那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对于东欧地区那些国家来说常常是太强大了,它们无法实施任何合理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特别是那种不仅对外国的资本所有者有利,而且也对本国公民有利的政策。

我的这本书主要研究的是东欧问题而不是中国问题,但把东欧国家与中国进行比较,可以使人们不仅能够对前者为什么会陷入经济衰退而后者为什么会保持经济的上升势头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比较还可以令人十分信服地澄清为什么东欧国家最后要采取过分激进的经济转型纲领,并且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样的转型为什么会带来毫无必要的经济困难以及所有权构成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将给该地区今后的经济发展造成阻力,而中国则走了一条与之截然相反的道路,而且进行得令人难以想象的顺利。

为了能够让这种比较发挥出其最大的效益,人们须使自己从东欧国家在研究经济转型时所采用的传统方法论中解脱出来。那种传统观念认为,经济转型是一个从国家过渡到市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将被边缘化,而市场的作用则得到扩展。结果,分析的重点放在了市场上,将之视作正在兴起的力量;而国家的作用则不受重视,认为国家将要隐退。事实是:只要经济转型还没有结束,国家就要作改革的主要代理。而且,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一种互为替代机制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乃是一种互补关系,也就是说,两种机制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本书并不把经济转型看作一个用市场来取代国家的过程,本书的立场是,经济转型需要同时对国家和市场进行改革。从根本上讲,这也就是说,在经济转型期间,对国家机器要进行重组,更多地采用间接的经济调控手段,或者说放弃直接的经济调控手段;与

此同时，又要使市场变得机制化，使其主体由非正式的、以权力为基础的的行为方式，转变为正规化，变得有法可依，依法行事。鉴此，经济转型的最终结果如何，将取决于对一国经济制度的这两条轨道各自实行改革的成功与否。

如果我们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始之时，一方面考察一下东欧国家以及前苏联的国家状况，另一方面考察一下中国的国家状况，我们几乎不会察觉两方之间存在什么重大差异。但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东欧国家以及苏联任由它们的一度强大的党的体制垮掉，结果使它们的国家机器失去了这些党的支持，从而使那些国家机器被推向毁灭。在东欧国家推行改革的正是这样一些其职能已经遭受严重损害的国家政权，而在中国，现存的党的制度并没有受到冲击，因而国家机关也没有受到冲击。

在政治动乱中间，许多新创的政党冒了出来，它们既缺乏适当的从政经验，也欠缺坚实的群众基础，在这样的氛围下，东欧国家的政府很快便让政府官员们的狭隘私利取代了公众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东欧国家的改革家们才选择了激进的，即高速度、大规模的改革方案。虽然官方的冠冕堂皇的说法是，这种改革方案是改变经济体制的最佳和最讲效率的方式，但他们的真实着眼点却并不在于此。激进的方法之所以会被选中，主要是因为这种方法可以使国家能够为私人利益创造出最大的机会。

也正因为如此，激进的改革纲领中才把对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当作了重点，因为这是满足私人利益的最有油水的潜在泉源。同样，官方对此的冠冕堂皇的说法是，采取这样的激进方法实行财产转让，对于这些经济体来说是最为有利的。但由于东欧国家政府都在忙于出售国有资产或者将之白白送人，它们已经不再认真地关注经济的总体形势了。这就是为什么东欧国家在面临生产下降、失业人数上升的局势时，竟没有一国政府采取过任何认真的措施，设法制定某种能够抵御由改革带来的这些负面影响的总体纲

要的原因所在。

最为重要的是,由于东欧国家把对公有资产实行大规模私有化作为其工作的优先领域,结果它们便把能够导致国家的作用被进一步削弱的强大力量也释放了出来。这些从一开始时就暴露出来的弊端变得愈益严重,以致这些国家已经无力再使这样的方向有误的改革发生逆转了。最后,即便私有化的任务已经完成,但由于缺乏资产,这些国家也只会仅剩下个已遭受严重破坏的政府了,这样的政府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那也很难再最终奉行那种能够充分利用经济资源的政策了。这样的政府尤其不准备采取措施,让本地资产的外国所有者一定要只给本地经济带来利益,而不得对之造成伤害。

在中国,由于那里保持了政治上的连续性,公共利益还在继续对党以及国家的决策产生驱动作用,因此东欧国家所采取的那种激进的方法,在这里的现实中并没有市场,与之相关联的那些风险也并不存在。中国也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不顾经济运行情况的好坏,而只强调要把改革作为优先领域。与过去一样,中国的主要目标依旧还是保持经济增长,为民众提供总体福利——充分的就业、稳定的物价和必要的平等。由于有这样一种轻重缓急的意识,所以,改革的范围只能以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为限。

我们事后来看,中国改革家们的最为重要的决定就是保持国有部门不动,推迟对这些部门资产的拍卖或者清理。无论做出这种选择的道理何在,中国的政府由于没有实行东欧国家那样的纲领,所以,能够避免东欧国家政府所遭遇的那种命运。这并不是说,中国进行改革期间没有出现愈益增多的政府官员追逐个人私利或者卷入腐败的现象。截至目前,这样的行为都还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按照中国政府最近宣布的那样,出售国有资产最终也将被允许,那么这种局面也可能会发展至失去控制。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政府须采取措施,一定不要让外国的所有

权占居主导地位，接管经济，尽管中国也同东欧国家一样，已经将自己的经济向外国企业开放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中国的改革已由初期阶段继续向前发展，从农业领域转入工业领域之时，中国的改革家中间有一种很强烈的意识：这个部门如要更新换代，更上一层楼，就必须大规模地引进外国技术。这样的大规模引进事实上已经实现，但并不是通过出售国有资产，而是通过采取合资的办法实现的。在合资企业里，外国人虽可以将自己的资本注入企业，但却不能取得对企业的控制权。

东欧国家的改革家们是允许外国人在几乎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接管它们的现有国有企业，而在中国，外国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接受这样的条件，即把必要的技术带进来，用于那些被认为最需优先发展的部门，这样它们才会得到许可。顺便提一下，流入中国的绝大部分外资都被引导到国有企业中去了，从而这些国有企业得到了它们所需的一股动力，使它们能够与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私营部门一比高下。自相矛盾的是，前来给中国国内的国有部门教驾的事实上正是外国的私营部门。

在东欧国家，外国的投资者在收购了大多数的公有资产之后，大部分都不再向该地区继续投资；而中国的情况则与东欧不同，外国向那里投资的兴趣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减。即使在中国也像东欧那样已经显著地减少了其最初时实行的对外国进口的限制措施之后，外国人向中国投资的兴趣也还是没有减弱，当然中国降低对外国进口产品限制的速度要比东欧国家缓慢得多，是逐步降低的。最近，中国又采取了另一个将其经济对外开放的步骤，加入了多边贸易体制。但即使采取了这样一个举动，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行动也还是要比东欧国家谨慎得多，尤其是与东欧国家要求加入欧盟的举动相比。

再有，从中国的情况看，人们认为经济增长而不是改革体制本身才是最需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经济开放，或者用当今人们常用

的说法——全球化,是须从属于经济需要的。因此,经济开放并不是一哄而起,而是采取了一种有选择的方式,只有当某一部门已经为迎接外国的竞争做好了准备之时,国家为保护该部门而实行的进口限制才会被解除。而且,当某一部门已经对迎接外国人的竞争做好了准备之时,本国企业被外国投资者接管的可能性以及外国所有权扩大的可能性实际上就并不会是很大的。

如果鉴以往而能知未来,那么东欧国家就很可能将面临更漫长的艰苦岁月,而中国则很可能继续走向成功。但是,中国虽然在与东欧国家进行比较时显得非常的成功,中国仍旧是成功与问题兼而有之。它存在的问题当中,有些是很严重的,譬如说所谓的巨额“坏账”已经成为主要国有银行的包袱;地区间愈益拉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或者水的短缺问题。然而直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并没能阻止中国继续显著地增长,中国的增长速度之高常常达到了实际上需要采取紧缩通货措施的地步。

人们很容易便会形成这样一种观念,认为中国的政府将同过去一样,在每次实行改革之前采取等待的作法,直到某一具体问题变得十分尖锐,不解决,经济的增长将面临危险之时,再采取行动。直至目前为止,这种等待花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战略,是卓有成效的,我们没有理由不认为这样的战略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发挥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是否还将继续认真地履行其宪法所规定的责任,是否还可以保留其及时履行这些责任的能力。但是,正如人们所说,虽然市场的力量在大踏步前进,但国家仍能对过度的腐败问题施以控制,所以,中国的快速增长很有可能还将继续发展一段时间。

虽然来自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并不大可能对中国的进一步增长构成威胁,但一些外部因素还是有可能对之构成十分严峻的潜在危险的。情况有可能是这样,控制中国发生的快速变化,要比控制外部发生的变化容易得多,近年来,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也在大大

加快。世界上的主要大国正在使自己适应于已经变化了的实力平衡,这期间凭借一国实力的单边主义概念与要求各个列强合作行动的多边主义概念发生了冲突。而且,地区间的关系也在迅速发生变化,许多地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区域集团。

这些外部的变化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造福于中国经济的继续扩张或者对之构成威胁,将主要取决于中国是否会在决定其外部局势时发挥积极作用,使之对自己有利。要发挥这样一种积极的作用就需要它努力不离开多边组织,而是加入这些多边组织,而且在有需要时设法对这些多边组织进行校正。这一点正是中国在最近加入了国际贸易机构之后实际上做的事情。过去中国人担心,加入这一机构会严重地束缚中国的回旋余地,但突然之间,在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实际上防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与东欧国家至少在加入欧盟时所表现出来的屈服于强权压力的情况不同,中国利用自己参加世界机制的时机,努力保证具体国际组织的程序能够允许所有成员国都具有平等的代表权。中国还坚持让这些国际组织不要在所有国家只推行单一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是采取多样化的态度,包括允许施行不同的机制,让国家发挥或大或小的作用,或者在分配国民财富时或多或少地考虑平等原则。

卡齐米耶日·Z. 波兹南斯基

2003年12月18日

目 录

引 言	(1)
-----------	-----

东欧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过渡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生,但同样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引发了灾难。灾难一开始就以真正毁灭性的经济衰退形式表现出来,其破坏程度之强为当代历史上所仅见。之后,这场灾难又表现为自毁自灭,几乎分文不取地将自己的大部分国有固定财产出让给外国人。

第一部分 恶性循环	(13)
-----------------	------

第一章 怪异的所有制	(15)
------------------	------

现在进行着的东欧国家的改革究竟产生了哪些负面的影响呢,对此实际上还从来不曾有人作过彻底的经济分析,因为整个这一过程,无论其历史影响有多么地深远,都是悄然无声地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可悲事实是不允许被外泄的,一旦有人对这样的情况作了披露,他们就会被恶毒的攻击所扼杀。

第二章 私有化造成的损失	(36)
--------------------	------

许多经济学家坚持认为,从社会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

资本,是由公民们过去创造出来的,现在应由国家平均地分还给他们。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国家几乎分文不取地将国有资产分给了外国人。

第三章 令人疑惑的经济转型 (63)

正在进行的由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体制转型,主要还停留在文字上,或者人们的头脑中,因为改革进行了10多年之久,现行制度内的主要弊病依然故我,并没有受到触动。

第二部分 没有国家的国家 (83)

第四章 人为的经济衰退 (85)

改革家们从未彻底纠正过的政策错误,不仅要对整个被窒息的经济负责,还要对将国有资产大规模地出售给外国人负责,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要让国内投资者将已被私有化了的固定资产变成可以赢利的经营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证明是无法做到的。

第五章 腐败泛滥 (113)

这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被大大削弱了地方,然而取而代之的却并不是什么在道德上很扎实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反,这里充满了另外一种东西——寡廉鲜耻,无所顾忌。这里的行为准则就是容许司空见惯的侵害

共同利益的现象存在,容许国家本身动辄就绕过法律行事。

第六章 卖破烂的商人…………… (141)

知识阶层的精英已经将自己由战后早期阶段时的前一制度的热情辩护士,改造成为最激烈地抨击那种制度的反对派。只不过他们这时又变成了正在东欧地区兴起的另一种病态制度的最狂热的支持者,这种病态制度就是那种由外国资本加本地劳动组成的奇异资本主义。

第三部分 危机地带…………… (175)

第七章 被歪曲的局面…………… (177)

由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转型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因为参与这场经济转型活动中没有几个懂得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仍旧感到战后时期的最美好生活还是在那一制度下的最佳岁月中得到的。

第八章 德国模式的翻版…………… (197)

按照仅相当于实际价值一个零头的价格将大部分国有资产出售给外国人,这就是通往“不完善资本主义”的“波兰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并非从波兰开始,它实际上完完全全是从前民主德国开始的,更确切地说是由前联邦德国开始的,当时前联邦德国迅速地对几乎已经毫无力量的前民主德国进行了改造,将其固定资产夺走。

第九章 历史的警告..... (224)

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改革,照理应该保证东欧回归欧洲,建立与之相同的制度,享受与之相同的生活标准,但现实中所发生的情况却是远离欧洲,由于引入的是不同于西欧的制度,所以,东欧不可能在生活条件上向西欧靠拢。

后记 (249)

参考书目(中文) (271)

参考书目(外文) (281)